

# 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的话语建构与中国方案

张涛

[摘要]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交往,海外华人多集中于此,他们多以“社团”形态立根当地,不但数量众多、组织庞大,而且积极参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海外华人社群为切入点研究华社与中国文学文化之关系,可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一条可行路径。由于华社在文化含义上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研究的多样性与艰难性,当下对华社“文化文学”含义的解读规模小、领域狭、队伍弱,急需加强。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亟待在“五个空间”取得突破:海外华人社群文献辑考、整理与汇总;海外华人社群历史分期及其古今演变;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古典“旧文学”;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全球区域国别海外华人社群“文化文学”案例分析。加大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既有益于推进“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又可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

[关键词]华社;中国文化软实力;体系建构;中华文化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区域地理社群文献整理与明末清初文学派别思潮图谱构建研究”(21BZW116);2023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党社运动与明清传奇研究”(2023JJ006)

[作者简介]张涛,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4)03-0068-07 [收稿日期]2023-08-08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特别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sup>①</sup>,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国家与区域治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奠定文化基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sup>②</sup>作为中外文化传播的使者、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呼吸共命运的海外华人社群一直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具有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以海外华人社群(以下简称“华社”)为切入点研究其与中国文化、文学之关系,可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一条可行路径。

## 一、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的体系创新与全球话语背景

《论语·泰伯》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sup>③</sup>在全球化的今天,展现中国大国形象须在文化上发力,因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根源”<sup>④</sup>。“文化战略谋划”成为当下“士”阶层肩负的历史使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杨伯峻、杨逢彬译注《论语》,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第101页。

④胡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思想渊薮》,《河北学刊》2023年第4期。

命。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上,习近平强调“要‘形于中’而‘发于外’”<sup>①</sup>,以“内功外发”“中外蓄力”的方法与形式“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在挖掘中国文化深厚内涵的同时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与博大文化传播出去。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成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方法,其意义重大,成效显著,但在一些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如有学者针对“对外传播主体单一,复合型传播人才不足,传播内容吸引力不高,对外传播渠道创建少等”问题<sup>②</sup>,建议“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化,手段多样化,方式本土化”<sup>③</sup>,通过五条路径“提效提质”:加强中国文化走出去顶层设计;创新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式;拓展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渠道;提升中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培养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人才,等等<sup>④</sup>。

当下众多学人亦从不同层面积极探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方式方法,如《“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以明清圣谕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一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六谕衍义》《圣谕广训》两部明清圣谕传播于日本并被模仿为例,阐明中国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互识互鉴以及更深层次的认同”,为“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借鉴与启示。<sup>⑤</sup>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十余年,党和国家不断加强文化软实力顶层设计,陆续推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以此推动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主张,达到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扩大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之目的。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内涵之一的文学艺术乃是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因此,国家开始重视“中外文化与国际汉学”研究,尤其加大对藏于“海外”的中国珍稀文献的“译注”“传播”“收集”“整理”“比较”研究的资助力度。在此时代语境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外文化传播的使者、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呼吸共命运的“华人社群”逐渐进入学人视野。

对海外华人社群文献进行整理,梳理其传承演变过程及其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有益于推进“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sup>⑥</sup>“三大体系”建设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自我革新,其本质意义在于守正创新、新旧交融。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科门类的“取舍”与“齐全”、“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相互介入与借鉴、学科建设与有用于当下等。海外华人社群的文学与文化审视构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个大类,它既是交叉的,又是新兴的,从而成为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与文化创新亟待解决的“学科交叉如何介入借鉴”问题。“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sup>⑦</sup>通过对海外华人社群文学概念、范畴、命题的系统构建,可以准确诠释“华人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体系,使其更为成熟和健全。

海外华人社群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文学、艺术、美学、比较文学等众多学科,以文化与文学视角审视华人社群须立足于文化文学本位,以新旧文学思想联合考察的方式、古代与现代文学互文解读的范式创新学科发展模式,加大交叉学科研究力度,以此带动基础学科和相关优势学科的同步发展,对中国文章学、文体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交流史、传播史的学科建设起到推动和深化作用,实现华人文学学科体系的优化创新,推进中国文学的全球化,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域。

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7页。

②杨红静《“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路径研究》,《文化学刊》2022年第8期。

③杨红静《“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路径研究》。

④姚琼、张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意义与推进路径》,《中国出版》2019年第21期。

⑤高薇《“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以明清圣谕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⑦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

中共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全球各种产业在相互依赖中发展。因之,文学文化亦要“全球化”,对海外华人社群的文学性研究可以让中国文学研究站在世界性、全球性的高度,以“打通内外,沟通中西”的方式解读当下,体现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与普世价值,以他山之石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外华人社群自始至终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力量,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总之,“文化强国”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保障,海外华人社群的文化与文学研究立足于全球化,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建构。通过海外华人社群研究,可以了解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了解中国文化如何在世界被“接收”和“接受”,特别是通过华人社群的文化与文学书写了解他国之“好”,为国家文化建设“走出去”提供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方法。

## 二、全球“汉文化圈”与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热点

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交往,这一时期大约有10万多华侨居住于“丝路”沿线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自清代末年至于20世纪上半期,海外华侨人数已达870万人。其中,713万人集中在东南亚一带,占总数的82%以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外华侨总数已超1000万人,时至今日更是达到5000万人以上,足迹遍及五大洲。他们多以“社团”组织形态立根当地,数量众多、组织庞大,如马来西亚现今约有9000个华人社团。<sup>②</sup>这些社团组织多以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身份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文化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sup>③</sup>,侧重“共享的知识和信仰系统或符号和意义”,是一个民族群体的“灵魂”,又是代表实体性存在的标志。因此,海外华社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中华文化寻根活动,以文化诉求表达他们的“客观存在”。如石沧金《保护、传承与发扬——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华人文化的举措与动态分析》<sup>④</sup>《试析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社团与华人文化发展的关系》<sup>⑤</sup>乃其代表,二文侧重讨论国别地域性政府与民间华社的文化措施与方法,如华社组织通过向政府提交《国家文化备忘录》、发表文化方面的宣言、举办华人文化节、成立马来西亚华社资料中心,组织精英文化义演等途径和方式维护华人文化的发展权益、保护并发展华人文化<sup>⑥</sup>。

在此方面,海外汉学家及本地学人因长期生活在当地,具有本地本土化文化背景,他们对华人社群文化的理解更能切入本质,视角也与中国大陆学人不同,研究也较为“客观”。如马来西亚圣恩大学政策研究和国际研究中心 Tan Yao Suaa, Thock Ker Pongb 与马来西亚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中国研究系的 Kamardin Ngaha and Goh Soo Khoona 合作的项目 Maintenance and propag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a Malay

<sup>①</sup>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sup>②</sup>以上数字参见王华《晚清民国华侨文献整理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胡春艳《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sup>③</sup>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sup>④</sup>石沧金《保护、传承与发扬——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华人文化的举措与动态分析》,《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

<sup>⑤</sup>石沧金《试析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社团与华人文化发展的关系》,《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

<sup>⑥</sup>石沧金《保护、传承与发扬——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华人文化的举措与动态分析》。

state: the role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Kuala Terengganu(《中国文化在一个马来国家的维护和传播: 中国协会在吉隆坡丁加奴的作用》)调查了吉隆坡丁加奴的七个中国协会在马来州内维持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作用,该文从民族习惯出发指出“华社”的“宗教敏感性”问题,即“华社”组织要考虑马来西亚穆斯林文化习惯,在举办文化活动时避免“冲突”,保持克制;同时还指出“华社”在领导层与财政上的一些“问题”<sup>①</sup>。这些本土学者的“华社”研究往往能直面现实、还原问题。

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引起中外学人关注。有学者从更广义的“汉文化圈”视域审视华社文学,杨中举的《东南亚华人流散族群及其文化、文学特征》就把“华人社群”作为“华人流散族群”的一种,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地区华文报刊的大量出现为华人发布各类文学作品提供了媒介载体,华人社群为华人文学创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华人学校为培养华人作家提供了教育保证。<sup>②</sup>以“混杂化”为特征的流散文学成为“汉文化圈”华文文学的一种。就整体而言,全球“汉文化圈”下的“华社”族群文学家的文学书写与祖国的文学思潮紧密相关,乃至影响到他们的文学革新。如李志在马来西亚最大的社团联盟刊物《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上所刊文章《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新马——论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指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白”语言之争影响了南洋文言小说与白话文小说的语言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海外华社“新一旧”文学的分水岭。<sup>③</sup>

鉴于近代以来海外华社的迅速发展及华社文学的“新一旧”之分,学术界亦分为华社“新一旧”文学研究两派。“旧文学”主要集中在以经学、注疏、音韵、训诂在内的传统“杂文学”范畴,侧重于研究“旧体文学”与“儒学教育”两个层面对华社文学的影响。李奎《早期新加坡文社与儒学传播探——以新加坡华文报刊为中心》<sup>④</sup>与金进《海外华人社群的分化与维新文人的文学记忆——以晚清驻新总领事黄遵宪的创作生活为讨论对象》<sup>⑤</sup>二文即考察了早期海外传统教育模式“文社”如何以“文言”体裁、“古体诗词”形式传播儒学,以及早期华社文人在说唱文学、戏剧表演、经学典籍、序文碑文方面的文学成就等。“新文学”研究目前集中在对以“全球性”“现代性”为特征的华社组织形态与活动方式进行“辑考”及传播层面的案例分析,如孙汉田《海外华人诗社、诗刊文化影响力案例研究——从“凤凰诗社欧洲总社”看新媒体条件下传统文化在欧洲的影响力》<sup>⑥</sup>、梁丽芳《华人文学团体在中加文学交流上的民间角色》<sup>⑦</sup>、伍燕翎《“一带一路”视域下马来西亚华人文教社团的建设和发展》<sup>⑧</sup>等,但缺乏对华社成员创作情况作有效的文本分析。

就总体而言,当下对华人社群“文化与文学”含义的解读规模“渺小”,领域“狭小”,队伍“弱小”,成果“量少”,需要加大力量。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华人社群在“文化”含义上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研究的多样性与艰难性,使得不同学科的学人还停留在“各自为政”的阶段,历史学家热衷于“考证”、社会学家侧重于“实用”、经济学家侧重于“价值”,需要加强“互鉴与交融”“介入与互补”。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华人社群是“主力”,文化的意义要通过文学载体集中体现。因此,加大对华人社群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的力度就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 三、海外华人社群研究亟待突破的“五个空间”

海外华人社群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搜集藏于东亚各国(日本、韩国、

<sup>①</sup>Tan Yao Suaa, Thock Ker Pongb, “Kamarudin Ngaha and Goh Soo Khoon. Maintenance and propag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a Malay state: the role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Kuala Terengganu” *Asian Ethnicity*, vol.13, no.4, September 2012.

<sup>②</sup>杨中举《东南亚华人流散族群及其文化、文学特征》,《东方丛刊》2019年第2期。

<sup>③</sup>李志《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新马——论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

<sup>④</sup>李奎《早期新加坡文社与儒学传播探析——以新加坡华文报刊为中心》,《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

<sup>⑤</sup>金进《海外华人社群的分化与维新文人的文学记忆——以晚清驻新总领事黄遵宪的创作生活为讨论对象》,《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

<sup>⑥</sup>黄会林主编《当代与传统: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第三极文化”论丛(2019)》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sup>⑦</sup>梁丽芳《华人文学团体在中加文学交流上的民间角色:以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为例》,《华文文学》2014年第5期。

<sup>⑧</sup>伍燕翎《“一带一路”视域下马来西亚华人文教社团的建设和发展》,《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5期。

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 图书馆、科研院所、侨联组织、田野碑文、私家收藏有关华人社群的各类文献资料 梳理这些文献中华社的组织形态、宗旨目标、发展演变、成员组成、经费经营、活动内容、中外交流及海外传播等。第二类: 各类华人社群的文学文化活动 如创办报刊、刊登作品、文学沙龙、征文活动、作品出版、戏剧创作、文化演出、华人教育、中外华社交流、华社与海外汉学(翻译与传播)等。第三类: 在华社类别中以文学类华社作为独立研究对象, 侧重研究文学性华社史学意义的考证辑佚, 梳理其组织形态、发展演变、成员及其作品等。第四类: 华社成员的文学书写 如碑文、序言、诗词、对联、书信、小说、戏曲等文体归类与艺术分析, 以及华社中文学家心态、文学思潮派别、文学理论的互相影响等。具体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突破:

其一 海外华人社群文献辑考、整理与汇总。从汉代至今, 侨居海外的华人群体历时较长, 人数众多, 他们组成的社团组织类型亦多样。对于海外华社古今中外文献的搜求一直是一个重点和长期任务, 笔记、史料、文集碎片化记载及馆藏报刊、华社文人作品皆需保存, 甚至要作田野调查。除了各国图书馆及科研院所保存的文献资料外, 还有一些地方性会社组织亦需走访, 尤需做好影印出版、事迹编年、汇集整理三项工作。影印侧重早期华社相关古籍文献, 特别是藏于海外机构的早期文学性华社成员的珍贵作品更需挽救整理。目前, 学术界还未进行系统与全面的文献整理工作。在此方面, 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 如王华的《晚清民国华侨档案整理与研究》<sup>①</sup>《晚清民国华侨文献整理与研究》<sup>②</sup>已梳理出全国各地相关海外华社档案馆线索、网络资源及华社文献工具书、珍贵藏本线索等, 他与李姝合作的论文《马来西亚华文文献调查与分析》<sup>③</sup>亦提供了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藏馆线索, 张峰《国家图书馆海外华文报纸收藏与利用初探》<sup>④</sup>可见海外华社创办的报刊, 在《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论文》中还辑录了很多全球馆藏线索<sup>⑤</sup>。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一生潜心研究东南亚华文碑铭史料, 完成了大量极为珍贵的有关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及编纂工作。他于1960—1970年代两度受聘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其间, 他在“新马”各地搜集了大量的金石碑刻, 并于1978年与马来亚大学的陈铁凡(Chen Tieh Fan)合著出版了《马来西亚的华人碑文》《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泰国华人铭刻萃编》等, 保留下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目前, 需要根据这些线索把有价值的相关文献析出影印, 汇集出版。

其二 海外华人社群历史分期及其古今演变。这一部分集中在海外华社发展史考察。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即古代、近代、现代、当代, 需要梳理各个时期华社政治文化背景、数量变化、兴衰演变、组织结构、宗旨意义、文化活动等。古代时期, “社”乃中国人“群”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组织形态。这一时期考察中华民族“社”之含义以及结社的血脉根源, 主要以汉代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使臣、传教士为对象, 基本分为起源(汉代)、发展(唐宋)、高潮(明清)三个时期。这里有一重要现象需要格外关注——明清之际一些文社成员流亡海外后继续结社, 此现象还未见有学者展开研究。近代时期可从1844年鸦片战争开始, 止于1911年辛亥革命, 以清末海外劳工及中国南方沿海城市移民结社为考察对象。现代时期可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止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世界动荡, 海外华人社群亦如中国本土各种现代社团兴起一样开始繁盛起来。如1937—1939年间, 泰国就出现了40多个华人诗社、读书会、研究社; 菲律宾有林健民1933年组织的黑影文艺社, 由蓝天民1936年领导的新生社; 还有由旅美华人组织的美洲华侨青年文艺社等。<sup>⑥</sup>特别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 海外华社数量更多, 如新加坡有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五月诗社、锡山文艺中心、琼州会馆文学会、海洋文艺社、写评人协会、阿裕尼文艺创作暨翻译学会; 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

①王华《晚清民国华侨档案整理与研究》,《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12期。

②王华《晚清民国华侨文献整理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③王华、李姝《马来西亚华文文献调查与分析》,《图书馆论坛》2015年第3期。

④张峰《国家图书馆海外华文报纸收藏与利用初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⑤《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论文》2003年3月。

⑥梅显仁《浅谈海外华人文社》,《八桂侨刊》2022年第2期。

亚华作家协会、砂崙越华作家协会、吡叻文艺研究会、南马文艺研究会、中华华文协会等；菲律宾有耕园文艺社、辛垦文艺社、菲华文艺协会、菲华青年文艺社、新潮文艺社、征航文艺社、河广诗社、儿童文学研究会、千岛诗社、菲华艺文联合会、晨光文艺社、菲华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现代诗研究会、岷江诗社、瀛寰诗学研究社、亚洲华文作家协会菲华分会等；加拿大有枫叶文艺创作社、温哥华白云诗社、加拿大华裔写作者协会等；欧洲有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法国华文作家协会、旅西华人作家协会、英国华文作家协会等。<sup>①</sup> 我们应以具有文化与文学意义的华社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做到点面结合。

其三 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古典“旧文学”。所谓“旧文学”指类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概念与范畴体系的“杂文学”，既包含经学、史学、音韵、文字形体、训诂、诸子等古代学术体系内的一切中国文字，也包含现代四分法的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华社“旧文学”研究包含上述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与“旧文学”相关的华人社群不仅仅包含文学性社群组织，凡是涉及“旧文学”范畴与概念的一切华人社群组织皆可作为考察对象。（2）把“组织形态考证”“文本细读”“社会文化语境”“中外比较”四种研究范式进行综合性“交叉”研究。特别是华社成员早期多为劳工，文化水平较低、作品相对较少，他们的文学活动类似于宋代“勾栏瓦舍”里的“说话”和话本小说类，且多以市场“讲古”与街头“劝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以“口头文学”流传于世。如新加坡崇乡会馆联合总会所出版的杂志《源》就收录了部分华社口头文学“过番歌”，表达他们的海外谋生“悲苦”与浓浓的“思乡”之情以及夫妻分离的无奈。<sup>②</sup> 因此，对于华社“旧文学”的考察，既要“视角多样化”，又要“取材多样化”，以广义的具有文化意义的“杂文学”与包含多民族、边缘性的广义的中华民族“大文学”来思考问题。（3）“文社”是明清时期伴随科举制度而生的一种“类教育”群体，需要特别注意此类传统“文社”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黄遵宪在新加坡担任领事之时组织“图南社”，每月举办“科举考试”“征联比赛”，传播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以改变当地披靡文风。<sup>③</sup> 这些文社成员的文学活动，社团领袖的“文本细读”及其与当地文人的关系等皆为“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另外，还要注意中国古体小说的多语言翻译、戏剧剧目及表演等“传播学”意义上的华社文学。

其四 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文学”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写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白”之争也影响到海外华社文学。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进行文学革新，后经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五四学人的积极呼应和《新青年》的宣传，中国实现了文学的“现代化”，类似于“文学研究会”的现代性文学社群可谓“遍地开花”。海外华人也深受其染，纷纷创建文学性社团组织，并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相呼应。“文白之争”也影响了海外华人的文学观念，他们借助华社主办的报刊进行系列“文学”革新。如新加坡创刊于1919年8月16日的《新小说会》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体裁是白话体，文言不要。”<sup>④</sup>这在当时的南洋不啻为一声惊雷。此后，南洋地区的报刊刊载“文言”类作品数量减少，“白话”类作品增加。仅此而言，华社研究必然要把海外华文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纳入视野，详细考察“文学现代化”背景下华社群体在组织形式、宗旨目的、创作作品、艺术形式、美学追求、传播理念、文化活动等方面如何继承和创新旧体华社文学。这里有两点需要格外关注：一是重点关注华人教育与华文报刊是如何介入中国文化（传统的和现代的）传播的；二是现代海外华社文学家创作文本在“思想”层面的两面性，即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连体”——小说场景是现代的，而文化元素却是古典的，如小说中的花木兰形象、四大名著人物、传统节日等等。

其五 全球区域国别海外华人社群“文学”案例分析。这一部分把对海外华社的研究扩展至“全球”。东亚地区是华人社群数量较多、规模较大的地区，可以选择几个最重要的、影响力大的华社进行个案性研究，其中“新马”是重点，如马来西亚影响最大的，合政治性、文化性、商业性为一体的“中华大会堂总会”。其他地区可以选择美国、加拿大等华社活跃地区进行“国别华社”案例分析，如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等。其

①以上华社见梅显仁《浅谈海外华人文学社团》。

②莫嘉丽《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兼论土生华人的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李奎《早期新加坡文社与儒学传播探析——以新加坡汉文报刊为中心》。

④李志《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新马：论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

中每一个案例皆可作为一个独立的选题来研究,未来也可以作为独立“方向”自主立项,有计划地出版多本专著。目前有学者已涉猎其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宋燕鹏的《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等,但此类作者多为“史学学人”,他们的研究多侧重于海外华社的历史形态,这显然是不够的。目前需要对国别层面的华社组织进行“文学意义”“历史意义”“传播意义”的综合性“联璧”研究,重在研究“文学性”(而非政治、经济、宗法性)社群的文学与文化活动、成员“文本”创作等“大文学”“杂文学”内涵。

总之,对海外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有学人相继提出“汉文化圈”“国际汉学”“华文文学”等学术命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小说、西方汉学家、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西方文学史书写、“一带一路”倡议等范畴,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应加大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立足“全球文学”视域下中国“文学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建构,以创造性的“华人社群”话语体系,填补充实中国文学学术体系,既立足海外华人社群的“主体性”,又体现华社文学的“原创性”,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华人文学体系与文化体系,充分展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Chinese Sol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Research

ZHANG Tao

**Abstract:** Sino-foreig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a long history.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xpanded China's trade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where many overseas Chinese settled, forming large "community", which not only have a large population and massive organization bu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can provide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e diversity and difficulty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current scale, scope, and strength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literature" within these communities are limited and must be strengthened.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literature urgently needs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the following five spaces: compilation, organiza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evol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se analysis of "cultural literature" of global regional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Strengthen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literature is beneficial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n provide essential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for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ies.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system construction; Chinese culture

[责任编辑: 杨程]